

# 全球化背景下的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认同及其重构<sup>\*</sup>

马丽蓉

**摘 要** 全球化背景下的阿—伊世界面临身份危机,对其进行文化身份认同,既是为了应对和抵制西方文化霸权,也是为了增强阿—伊世界的凝聚力,在和平、发展与和谐共处等认同中尽快融入全球化的主流。在正视美国为主的西方霸权主义对全球认同的侵蚀、伊斯兰激进主义排他暴力对阿—伊文化认同的干扰的前提下,对阿—伊文化身份进行辩证、前瞻、多元和务实性重构是必要的。

**关键词** “大中东”战略 全球化语境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4812(2006)05-0056-63

—

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倚仗雄厚的硬实力将自己的“普适价值观”向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强力倾销,其政治意识、经济理念和文化观念所形成的文化霸权思想渗透甚至充当着全球文化认同,美国文化霸权的实现就是一个赢得全球价值共识的过程,亦即推行西方化甚至美国化的认同过程,全球化也就变成了西方化乃至美国化。

具有自足思想体系的伊斯兰文明也力图依靠丰足的文化资源来因应这种挑战,并积极付诸实践:伊朗前总统哈塔米早在 1998 年就曾建议联大将 2001 年命名为“文明对话年”,2001 年 11 月 8—9 日召开的联大曾致力于文明间的对话,但美国拒绝参会,公众也因“安全”之故被拒门外,媒体几乎一无所知,当年发生的“9·11”事件则以悲剧的方式印证了此次会议的重要性。近年来,约 50 位阿拉伯学者受联合国和阿盟的委托,相继发表了 3 篇《阿拉伯国家人文发展报告》,表明阿拉伯世界开始致力于文化自检与身份重构,标明文化精英面对全球现代化挑战的积极态度与务实作风。但“由于中东现代化是在社会远未实现文化自觉的情况下在外部压力下仓促而起的,社会民众缺乏传统与现代化冲突的心理准备及足够的心理承受力,从而在社会文化和精神心理危机中诉诸于文化寻根,这也正是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文化表达”。<sup>[1]</sup>

自美国对该地区相继进行军事打击、经济制裁和民主改造以来,民众在“圣战”思想的感召下奋起抵抗,与异教徒的冲突还扩延至伊斯兰内部教派间甚至不同政治利益集团间的冲突,原本为抵制文化霸权、抵抗强权政治的弱势文化群体的正当文化防卫之举,结果却导致由外到内的排他暴力频起,文化的坚守在特定环境中偏离方向。但“差异不应该成为本

<sup>\*</sup> 本文属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西方霸权语境中的阿拉伯—伊斯兰问题研究”项目(2005BGJ006)。

地区冲突和矛盾的根源,而应该成为本地区相互借鉴和融合的动力”。<sup>[2]</sup>同时“各国应该维护世界多样性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坚持平等对话和交流,倡导开放和兼容并蓄的文明观,使不同文明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应该承认各国文化传统、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发展道路的差异,不能以此为借口对别国内政说三道四,更不能把世界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和矛盾归因于哪一种文明、哪一个民族或那一种宗教”。<sup>[3]</sup>而美国却无视这一切,在白宫官员看来,“狭隘地界定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并把注意力几乎完全集中于获得能源或建立军事基地,这种做法已经不再具有可持续性。忽视许多社会内部引发动荡的种种问题,只会使疏远和绝望成倍地增长,并造成一种对恐怖主义的支持不断增长的社会气候。因此,作为一种替代办法,我们需要与阿拉伯世界确立一种更为广泛的新型关系,以便鼓励并且促使阿拉伯国家的政权能够逐步解决‘自由赤字’的问题”。<sup>[4]</sup>

基于自身诸多现实利益的考虑,美国决定向阿拉伯国家推行“大中东”民主改造战略。针对美国强行在中东地区履行“民主的义务”,阿拉伯世界既意识到自身所存在的某些“民主赤字”,也怀疑美国改造中东的战略意图,还敏感于外来的强权干涉,尤其反对外来力量玷污和破坏悠久的历史与古老的文化:“如果说美国实施该计划的公开目的是在阿拉伯世界建立民主社会,那么其背后的目的主要是:改变阿拉伯和伊斯兰文化的结构以及这个地区人民的思想;播种思想和经济自由化哲学的原则和价值观;为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利益服务,其利益只有通过民主模式来封锁对美仇恨和憎恶的根源才可能得到保证;在战略上为以色列服务,使之成为这个地区的一部分。”<sup>[5]</sup>

不可否认,美国借“反恐”之名实施政权更迭式的民主改造,也加重了“大中东”地区在全球化中被边缘化的程度。正是由于“西方文化霸权的扩张,使得伊斯兰世界自近代以来所面对的异质文化的压力进一步加重,诱发了伊斯兰社会的认同危机、社会文化危机、合法性危机、精神危机等一系列危机”。<sup>[6]</sup>阿—伊世界才出现了以强化文化认同来应对、抵制美式全球化的抗拒行动甚至恐怖事端,“9·11”事件也是弱势文化反抗文化霸权主义的一种极端宣泄。

“9·11”事件后,美阿之间的紧张关系已成为影响世界和平的首要因素,惟有加强彼此间的沟通、对话、理解、尊重与合作,才有可能缓解暴力冲突,媒体尤其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在由西方政治家、学者和传媒共谋而成的西方霸权语境中,或道听途说、或断章取义,甚至别有用心地用西方概念来诠释和重构阿—伊文化身份,主观武断地为世界给定了一个作为西方之“他者”的被扭曲的“阿—伊世界”形象,不断解构、碎化着阿—伊文化认同,使中东穆斯林最终成为文化上的“流离失所”者。尤其在臆造“假想敌”的利益驱动下,西方传媒非但没有积极致力于不同文明间的沟通 and 了解,反而助长了无知和偏见,特别缺乏对异质文明及其信仰的体认与尊重,竭力歪曲阿—伊文化的和平本质,在有关圣地、《古兰经》及先知等相关事件的报道中屡次犯忌,辱没文化尊严,甚至将阿—伊世界渲染为暴政和暴力当道的恐怖泥潭。可以说,西方传媒对阿—伊文化身份的解构与重建,既误导了国际社会对阿—伊文化的身份认同,又干扰了阿—伊世界的自我定位;既挫伤了阿—伊民众心智的创造力,又进一步恶化了阿—伊国家与国际社会沟通的交流渠道;既模糊了西方现代文明外围的民族文化身份,又加剧了阿—伊文化内在的身份冲突。在西方政治干涉、能源攫取、军事占领以及传媒造势,尤其是“大中东”民主改造等诸多因素的合力作用下,阿—伊文化身份面临严重的危机。

尤需强调的是,“在阿拉伯世界,伊斯兰教作为阿拉伯人深层的精神现象的一个显著特

点是,每当阿拉伯民族产生危机感时,传统的宗教信仰就特别容易外化为人的行为,成为价值取向的源泉,甚至会导致一般人难以理解的狂热行动”。最明显的莫过于对“圣战”的狂热维护了。尽管“圣战”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内涵,“但它却一直是阿拉伯领导人用来动员穆斯林群众起来对付以色列‘魔鬼’的最有效的武器”。<sup>[7]</sup>因此,阿-伊文化身份认同,既面临着如何摆脱身份危机的严酷现实,又面临着如何进行身份重构的艰巨任务,还面临着如何才能智慧地运用身份战略来化解矛盾的心智考验。

## 二

事实证明,伊斯兰教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重要文化基础之一,近代阿拉伯民族运动几乎都以伊斯兰认同为依托展开的:纳塞尔坚信“神的全部启示实际上都体现于革命之中了”,在他领导下的埃及对外高举伊斯兰旗帜,对内又将伊斯兰机构纳入阿拉伯民族主义国家体制内;萨达特虽然强调国家的宗教属性,但对外更重视国家认同,采取亲美国和对西方实行自由开放的政策,其耶路撒冷之行与“戴维营协议”的签署乃至遭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刺杀等即为明证;霍梅尼强调“伊斯兰教同政治不可分离”,认为伊斯兰既是民族主义,也是国际主义,伊斯兰革命在伊朗成功后应向全世界输出;两伊战争并非一场宗教战争,但西方国家却借伊拉克来阻止伊朗输出伊斯兰革命,以防伊斯兰认同殃及西方的中东利益;海湾战争也不是宗教战争,但萨达姆却将伊斯兰认同当作战略武器来使用,他的以“圣战”名义抗击西方盟军的号召,既调动起穆斯林世界的宗教情绪(连阿拉法特都公开支持萨达姆,致使巴解组织陷入困境),还促成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大力支持。但“由于伊斯兰教内部的教派矛盾加之伊斯兰国家之间权力与利益的矛盾,伊斯兰教在发挥对伊斯兰国家关系进行整合并促进彼此合作的同时,也在某种情况下卷入了伊斯兰国家间的冲突”,<sup>[8]</sup>于是,伊拉克境内、外伊斯兰教派矛盾与伊朗向伊拉克输出伊斯兰革命而遭抵制等引发了两伊战争,宗教认同非但没有成为凝聚两国穆斯林的精神纽带,反而成为两伊爆发战争的诱因;海湾战争更是同族、同教的阿拉伯兄弟国家间的兵刃相见,印证了民族、宗教认同往往屈从于国家与集团的利益认同;20世纪80年代,美国招募并训练了包括本·拉登在内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来遏制入侵阿富汗的苏联向中东渗透,本·拉登们在宗教认同的鼓舞下击败了苏联,组建了基地组织。结果,美国落入当年视伊斯兰认同为其战略手段而精心挖掘的“阿富汗陷阱”难以自拔。近年来中东所发生的重大国际事件也蕴含着身份认同的得失成败,其经验教训极具言说价值。

巴以冲突的文化根源是伊斯兰教“第三大圣地”与犹太教“应许之地”的争夺。据《古兰经·夜行》载:真主“使他的仆人”穆罕默德先知“在一夜之间”“从禁寺到远寺”且“在远寺的四周降福”以昭示其“一部分迹象”;又据《圣经·创世记》载:上帝向犹太始祖亚伯拉罕许诺将迦南全境“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而“来年返回耶路撒冷”便成为犹太复国主义兴起、发展并不断强大的根本原因。正是因为过于强调宗教与民族认同,巴以两国的领土争夺便升级为阿、犹两大民族间的恩怨、伊斯兰和犹太两个宗教间的冲突。几次中东战争几乎都因巴以冲突而起,也几乎都因巴以矛盾而埋下隐患,巴勒斯坦解放事业也被泛化为阿拉伯民族的共同事业、世界伊斯兰事业的核心;散居世界的犹太人在强烈的宗教与民族认同的支撑下,从各地移居以色列且复活了希伯来语,美国的犹太院外集团更对美中东政策尤其在巴以问题上的立场施加了影响,美在巴以问题上的“袒以压巴”立场又加剧了阿、以民众的反美情绪。目前,巴以和平“陷入僵局”,既与哈马斯执政、奥尔默特当选有关,更与巴勒斯坦、以色列和美国三方领导人的认同冲突有关。作为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坚持认为圣地

归属问题不容谈判,只有进行“圣战”赶走异教徒犹太人,才能解救巴勒斯坦人民。但过于强调宗教和民族认同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国家认同,甚至产生某些负面影响。哈马斯应尽快完成由武装派别向执政党派的角色转变,由一味对抗以色列的宗教、民族认同逐步调整为解决民生疾苦、平衡党派利益、谋求国际支持与共赢等国家乃至全球认同;以色列和美国也应尊重巴人的民主意愿,不可以“哈马斯是恐怖组织”为由联合封杀巴新政府,也不该借“反恐”淡化或回避侵略的本质。

美国政府原本想在倒萨之后,将伊拉克建成“中东民主样板”,并完全控制其油气资源。但结果没能如期收获民主的果实,如愿谋到能源利益,还将伊拉克这个大油桶变成了中东火药桶。自美国开战以来,伊拉克就变成了基地组织抵抗异教徒的主战场,制造“恐怖分子”的策源地。其他阿—伊国家甚至某些西方国家的青年组成的“外国兵团”与伊拉克反美武装力量共同抵抗美英联军,尤其是阿里·哈迪清真寺遭袭后,什叶派和逊尼派、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不同利益集团甚至什叶派内部等均存在矛盾和纷争,结果巴格达沦为暴力之都。而且,后扎卡维时代的报复性冲突将会进一步恶化伊拉克的重建环境,深陷数重认同怪圈的伊拉克各武装力量、政治与宗教派别以及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还将不断削弱甚至解构伊拉克民众迫切需要的国家认同(诸如和平、民主、生产、自救等)。事实证明,三年前发动的一场“无正当理由的战争”,如同启开了中东地区的潘多拉盒子,灾难与罪恶、丑闻与血腥、悲愤与绝望弥漫于巴格达的上空,伊拉克重建充满了太多的变数。这是教派、民族与利益认同置于国家认同之上所导致的恶果,亦即,因身份冲突与利益纷争所致的排他暴力不断粉碎了伊民众重建家国的强烈意愿,还将国家推向内战的边缘。

伊朗核问题之所以触动了“世界神经”,很大程度上就与伊朗总统内贾德将伊斯兰认同作为一种战略手段来化解核危机、捍卫核权利有关。他声称要“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质疑欧洲“排犹屠犹”的历史,甚至和美国只就伊拉克问题进行破冰谈判。但他的“灭以”号召并没有产生如当年“拉什迪事件”般的效应,阿拉伯国家对伊朗过于干涉伊拉克内政普遍不满、对伊朗为首的伊斯兰什叶派新月带的形成深感不安、对提炼铀浓缩并组织人弹的伊朗政府十分戒备。当然,内贾德运用宗教认同的战略目的也与当年的萨达姆有惊人相似处:用消灭以色列、夺回耶路撒冷来重新唤起伊斯兰世界的普遍认同与大力支持,从而将伊朗核问题纳入伊斯兰共同事业之中,在激怒以色列和阿—伊世界开战后再将伊朗问题巧妙地揉入巴勒斯坦问题之内,在转移世界核关注视线的同时达到向美国施压的目的。在宗教认同战略遭冷遇后,内贾德又以“捍卫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力”为新的反美战略,结果寻到了解决危机的新策略。“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和足够的勇气去实现双赢。因此,博弈不仅要考虑伊朗人所说的‘珍珠和棒棒糖’,美国人讲的‘胡萝卜和大棒’,更要融合各方的文化、价值观”,<sup>[9]</sup>从而来沟通彼此、趋向共识,寻求解决国际争端的最佳战略。

在全球化时代,不仅中东地区的宗教、民族、国家和个人等认同已受到全球认同的极大冲击,其区域认同也未能幸免。阿拉伯联盟是1945年3月22日在开罗成立的中东阿拉伯国家区域组织,目的是为了加强与协调成员国的政治、文化、经济和社会规划及调解成员国之间或成员国与他国间的纠纷。但阿盟却因内部政治问题,尤其是巴以问题上的分歧而遭削弱;海湾战争爆发后,伊拉克与科威特、沙特矛盾激增,美国等西方国家势力进一步渗透中东,重挫了阿盟的政治声望;“9·11”事件后,尤其是美国强力推行“大中东”战略以来,不断削弱了阿盟在该地区政治、文化及经济等方面的协调功能。同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等区域组织也都经历了由盛趋衰的相似命运,

其组织职能已丧失或逐步丧失,尤其在中东重大问题上丧失话语权甚至参与权。因此,阿盟等区域性合作组织应在国家利益与全球发展中不断发掘区域共识的认同空间,以扭转被架空的实际处境。

从身份认同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中东历史与现实后发现,阿拉伯与伊斯兰认同确曾在阿-伊各国反对殖民主义、追求民族与地区独立方面发挥了凝聚民心、团结民众、整合力量并共同抗辱反侵等积极而重大的作用,也因过于强调宗教与民族认同而在某种程度上又加大了巴以问题解决的难度、客观上削弱了伊拉克重建中所急需的国家认同甚至成为强权政治家惯于利用的政治筹码。因此,阿-伊文化身份认同也牵涉中东乃至世界重大国际争端的解决策略及其手段方式,其成败得失值得总结。因为,“中东是具有世界影响的重要地区。没有中东的稳定和发展,就没有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一个和谐的中东符合本地区各国和各国人民的长远利益,也是世界的共同期盼。”<sup>[10]</sup>

### 三

身份认同既是为了肯定民族历史、持守文化传统,更是为了丰富与发展、捍卫和建设,认同也是为了重构。“全球化或许会消解国家的权威,或许会改变主权和民族性的含义,但它同时还强化着认同意识的重要性。我们世界的全球化程度越高,对认同的向往就越强烈。”<sup>[11]</sup>在全球化时代,阿-伊文化身份也面临着重构的现实挑战。

第一,既要继续持守宗教与民族认同,又要适时调整认同次序,正确处理宗教、民族、国家与全球认同的辩证关系,尽快扭转被边缘化的现实困境。

对文化身份内涵,即构成文化身份的成分的强调各有不同,但在其诸多成分中,价值观念、语言、家庭体制、生活方式及精神世界等是最为重要的。其中价值观念包括宗教信仰、伦理原则、世界观和人生观、集体和个人的社会理想等,这是文化身份的核心部分。比较而言,中国人多强调家庭、伦理认同,阿-伊世界则更重视宗教、精神认同,折射出“家国同构”的儒家文化与“政教共相”的伊斯兰文化之不同,也凸显出伊斯兰文化具有极强的社会整合性,“把不同肤色、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阶级、不同职位、不同思想风尚、不同政治态度、不同文化水平、不同年龄的人紧密地‘粘合’在一起,成为具有共同信仰、共同崇拜对象、共同组织形式、共同教义和教规、共同礼仪和活动方式的社会实体和力量”。<sup>[12]</sup>

作为全世界13亿穆斯林共同的历史传统、精神信仰、价值判断和生活方式的信仰体系,伊斯兰认同直接影响到阿-伊世界与国际社会的交流合作,甚至成为国际与区域合作组织的精神纽带与沟通桥梁,如在中亚五国伊斯兰复兴中形成的伊斯兰合作圈、伊朗提出的“穆斯林共同市场”、土耳其构设的“泛突厥联盟”、巴基斯坦筹划的“伊斯兰新月区”以及伊斯兰会议组织、世界穆斯林大会、阿拉伯联盟、石油输出组织、海湾合作委员会等均烙有鲜明的伊斯兰文化色彩。但阿-伊各国也因过于强调伊斯兰认同而使自己陷入被边缘化的现实困境中了。在“世界文化即将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核心任务将是在反思和沟通的基础上,建设一个多极均衡互利,多元文化共生的全球化。只有这样的全球化才能保证人类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保证世界得以安定和谐地持续发展”。<sup>[13]</sup>

而当下的全球化却具有双刃性:“一方面,它能迅速扩展繁荣和稳定;另一方面,它也会迅速将贫困和动荡传播到全世界。对于应对和影响外部环境能力较强的发达国家,全球化提供了谋求利益最大化的有利条件,意味着进一步占有世界的资源、市场并取得资本主义的全面胜利;而对于欠发达甚至比较落后的国家,全球化既是借以实现经济繁荣的机会,更是

遭受灾害、危机和导致多种矛盾激化的根源;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甚至意味着混乱和绝望。”<sup>[14]</sup> 身处明显劣势的阿—伊国家面临严峻挑战:“第一,随着市场自由化、工业私有化,国家支出削减以及通货膨胀,改革就容易破坏当地经济的稳定。第二,经济改革旨在与外国资本和全球市场接轨;随之而来的自由化除了直接影响经济生活之外,还将使穆斯林社会遭受市场文化以及个人主义和消费至上主义的全面冲击……当然,穆斯林政治和伊斯兰文化有时还造成了一些适应性方面的障碍。这些障碍既不利于市场进一步自由化,也不利于与全球经济有效进行交往。然而,世界上的各种改革已经启动,新的全球化开始敲打它的印记。而几乎所有的穆斯林社会在每个重要方面都面临着改革的需要。”<sup>[15]</sup>

中东又是美国发动反恐战争、进行民主改造的重点地区,尤其受“9·11”事件的影响,阿拉伯世界发生了不同程度的阵营裂变、经济滑坡与文化衰微,民众遍生认同焦虑,强烈的宗教与民族认同又不断激化着与外界的矛盾与冲突。因此,阿—伊各国应适时调整身份认同内涵次序,即将国家认同置于宗教与民族认同之上,进而谋求全球认同。因为,“当民族认同中关于和平、发展的许多价值追求在本民族范围内难以完整实现时,跨民族的全球认同愿望便应运而生。在一定意义上讲,全球认同满足了民族认同所追求的、但在单个民族间都难以实现的目标追求。因此,全球认同不是以淡化甚至消灭民族国家认同为前提,相反,它是沿着民族国家认同的积极思路而又跨越其范围、层次和目标的互补性认同。它本身就暗含了各民族的动机和利益”。<sup>[16]</sup> 同样,当“和平与发展”的国家认同在阿—伊各国难以实现时,就应积极探寻跨民族、宗教和地区的全球认同途径及行之有效的办法。唯其如此,才有可能逐渐改变在全球化中被边缘化的现实困境。

第二,既要立足阿—伊世界的社会现实,又要发掘伊斯兰认同中的全球质素,竭力淡化或规避阿—伊文化身份认同中的排他暴力倾向。

当西方文化成了规范性文明,非西方文化被边缘化,并将全球认同混同于美国主导的文化霸权之际,美国主导下的战争、制裁与驻军,造成阿—伊民众生存环境不断恶化,再加上高人口增长率、高文盲率、高失业率、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经济发展陷入迟缓等一系列社会问题都严重阻碍了阿—伊各国融入全球化的进程。显然,这些棘手的社会问题才是自由、科学和经济发展的阻力,伊斯兰教与全球化并不矛盾。

其实,“伊斯兰的世界观本身就具有全球性。在真主眼里,世界没有东西方之分。伊斯兰世界虽然由生活在不同种族、地域和政治边界内的不同社会和国家所构成,但是,它们却使用所有穆斯林都能理解的语言,并且拥有共同的文化意识,还承认同属安拉的信徒”,“蕴含着有利于全球化发展的力量,而且如果它希望就有可能再度对全球化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即使在今天,伊斯兰文化仍在影响着世界建筑、食品、服装、音乐、文学、艺术等领域的发展”。<sup>[17]</sup> 因为,“当民族国家认同与全球认同以不同的方式、层次和向度被正确区分,文化霸权从全球认同中剥离出来的时候,优秀民族国家文化的弘扬便显得格外光明正大、合乎时宜。由于全球认同所体现的是各个平等的民族、国家的共同愿望和利益而不具有任何偏狭自私的霸权性质,因此它实质上成为民族国家文化的合理延伸;由于优秀的民族国家文化大多都表达着和谐、关爱、宽容甚至‘大同’的价值观,因而它内在地成为全球认同构建的哲学基础和文化前提”。<sup>[18]</sup> 但因阿—伊各国政府几乎都无法尽快、圆满地解决所面临的严重社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民众对现政府的不满和怨怒,伊斯兰组织便填补了“权力真空”,它们往往以伊斯兰认同来凝聚民心,并为弱势群体提供慈善服务。

自美国接连发动“反恐”战争以来,美—阿关系日趋紧张,在虐囚、亵渎《古兰经》甚至讽

刺先知等受辱事件的刺激下,伊斯兰激进组织以“圣战”为旗帜来捍卫伊斯兰文化尊严的号召引起民众的情感共鸣,进而赢得选民的广泛支持,中东伊斯兰激进组织便通过议会选举乘势壮大了自我。因此,“‘9·11’恐怖主义袭击之后,将‘身份’或‘认同’作为文化关键词来研究时,尤其要警惕,不能以‘爱国主义’和‘宗教纯洁’的名义来强化民族身份的排他性,为‘圣战’或‘十字军’提供口实。”<sup>[19]</sup>原本倡导和平、对话与中间主义的伊斯兰文化在西方霸权语境中之所以被演绎成“暴力文化”,除美国对中东的一系列不公正政策外,还与“圣战”被伊斯兰激进组织甚至极端组织所滥用有关,更与“9·11”造成世界穆斯林“被审被辱被打压”的精神病灶有关。在强烈的“圣战”认同意识的驱使下,伊斯兰激进组织执政的合法性也因“恐怖”之嫌而遭美欧的“封杀”,哈马斯的内外交困便折射出伊斯兰认同中容他与排他间的激烈冲突。要正确引导民众的伊斯兰认同,政治家、学者与传媒应齐心协力于不断强化和平、发展与和谐共处的阿-伊文化本质理念,大力规避排他暴力意识,要“借助彼此之间的交流和对话,自我与他者可以得到相互型塑,进而形成一种‘既此且彼’而非‘非此即彼’的共享式关系。这一点,不仅对于国家范围内的公民建构新的归属感是使用的,对于全球化条件下的个体而言,也有助于他们解决因归属感的削弱所导致的认同焦虑问题”。<sup>[20]</sup>因为,“对认同的追求可能会导致一种有害的排他意识,它可以表现为狭隘的民族中心观念和排外暴力。只有通过对话,我们才能找到一种真正的全球交流方式,并对多样性保持真正的尊重”。<sup>[21]</sup>

第三,既要彻底吸取西方霸权主义干涉下身份认同中的血的教训,又要积极借鉴认同世界的成功经验,在多元与务实中尽快融入日新月异的全球发展主流当中。

在阿-伊世界自殖民至后殖民的漫长历史上,西方霸权主义对穆斯林培养世界和平文化的努力造成了重大伤害,尤其借“言论自由”为名肆意歪曲伊斯兰文化本真,甚至蓄意伤害最基本的宗教情感,在充满成见和敌意中向全球传播“恐伊症”,“9·11”事件发生后,在报复冲动驱使下的美国政府对阿-伊世界进行军事打击、经济制裁、民主改造等强权干涉,将民众逼入生存困境与认同困境当中,尤其“作为一个在文化上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体,基于融入新的生活群体的需要,他需要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在原有的话语和叙事中所建构起来的理想形象,转而去追寻他者。这种从自恋情结走向他恋情结的过程,是一个伴随着焦虑和痛苦的过程。面对新的认同对象,原有族群或国家在人们心中留下的烙印是挥之不去的”。<sup>[22]</sup>他们在归属感和身份感丧失的焦虑和痛苦中还不断丧失着生命、家庭及国家,惟有伊斯兰信仰成为存活下去的唯一理由,但却为此而付出了血的代价,宗教认同中的排他暴力也殃及了无辜的穆斯林。因此,阿-伊国家既要反思现实,更要积极借鉴中国成功认同全球化的经验——对内认同“和谐社会”,对外强调“和谐世界”,以儒家文化“和而不同”的和谐理念与全球认同趋近,在和平崛起中主动承担世界大国应尽的责任与义务。“面对客观发展的全球化趋势,伊斯兰国家要想获得发展,惟有顺应这个进程,努力参与其中进而施加影响,进而趋利避害,而不是排斥或加以阻止。在参与的过程中,伊斯兰文化及其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也将接受其他社会的一些因子,显示出更多的多样性”。<sup>[23]</sup>

实际上,阿拉伯国家已经开始了灵活、积极的外交与经济等方面的重构努力:在巴以关系处冰冻期时,以色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却在升温,根源在于“伊拉克的动荡局势促使某些国家开始寻找盟友”、“伊朗新上台的强硬派政府毫不掩饰地表露了成为地区强国的野心”、阿拉伯国家的“长远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以色列是技术和技能的重要来源”之地等。<sup>[24]</sup>因此,卡塔尔外交大臣和以色列外长于2005年9月在纽约联大期间举行了会晤,卡

提供了 350 万英镑为在以色列的一支阿拉伯足球队修建体育场;自 2000 年巴林王储会见佩雷斯后,两国一直保持着不间断的低调接触,并结束对以的经济抵制;除叙利亚、伊朗和黎巴嫩仍严格采取抵制态度外,许多阿拉伯国家在美、欧、以巨大贸易利益面前逐渐缓和了抵制的态度与力度;2005 年沙特加入了世贸组织,不得不同美、以开展贸易往来。对此,以色列央行行长也承认,“对于我们以色列人来说,与我们的阿拉伯邻国进行经济交流或许是有好处的;我们应该尽一切力量来使其变得可能,但单从经济方面来看,这并非是一种生死攸关的需要,因为这不会改变以色列经济的性质:远没有被封锁,与外界保持着密切的交往”。他还特别提到了以巴经济互补问题,认为,“双方的经济交流越多,就越能给每一方带来好处,特别是给巴勒斯坦经济。尤其在巴勒斯坦人看来,这种相互的自由贸易可能会很有益。我希望政治变化和安全状况将使这样的关系变为可能”。<sup>[25]</sup>

可见,阿—伊世界的身份重构凸现出多元和务实的质素,且已初见成效,这是顺应世界发展潮流的积极举措。“如果说平等确立了跨文明对话的基础,差别便使这项共同事业显得更加可欲、必要、值得和富有意义……多样性可以使我们营造一个开放的、充满活力的共同体。我们有与多元文化打交道的经历,我们共同怀有消除各种巨大障碍的决心,我们一直致力于申明持久的社会关怀,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我们认识那些对一个负责任的共同体来说具有至关重要意义的价值”。<sup>[26]</sup>

注释:

- [1] 张骥等:《文化与当代国际政治》,人民出版社,2003 年 12 月版,第 359 页。
- [2] 胡锦涛:《促进中东和平,建设和谐世界》,《光明日报》2006 年 4 月 24 日。
- [3] 同上。
- [4] Richard N. Haass, Remarks to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2002 Annual Conference, "Reflections a Year After September 11," September 13, 2002, <http://www.state.gov/s/p/rem/13442pf.htm>
- [5] 《阿拉伯人与大中东计划:阿拉伯人如何面对挑战》,载[沙特]《生活报》2004 年 5 月 31 日。
- [6] Hrair Dekmejian, *Islam in Revolution, Fundamentalism in Arab World*,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7] 以上均引自朱威烈主编:《国际文化战略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年 11 月版,第 186—187 页。
- [8] 同[1],第 267 页。
- [9] 杨逸洪:《世界杯、鸡尾酒及核谈判》,《文汇报》2006 年 6 月 9 日。
- [10] 同[2]。
- [11] [美]杜维明:《全球化与多样化》,载《全球化与文明对话》(哈佛燕京学社编),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 年 9 月版,第 81 页。
- [12] 张铁南主编:《宗教知识小百科》,长春出版社,1991 年版,第 4 页。
- [13] 乐黛云:《建构另一个全球化》,《新华文摘》,2006 年第 1 期,第 108 页。
- [14] 高祖贵:《美国与伊斯兰世界》,时事出版社,2005 年 2 月版,第 75 页。
- [15] Simon W. Murden, *Islam,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New Global Hegemony*,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2002, pp. 94—95.
- [16] 傅华:《全球认同与民族国家文化认同》,《光明日报》2006 年 4 月 18 日, <http://www.phoenixtv.com/phoenixtv/83927968816037888/20060418/780470.shtm>
- [17] 同[14],第 75 页。
- [18] 傅华:《全球认同与民族国家文化认同》,《光明日报》2006 年 4 月 18 日, <http://www.phoenixtv.com/phoenixtv/83927968816037888/20060418/780470.shtm>

(下转第 75 页)



[ 3 ] David K. Eiteman, Arthur I. Stonehill and Michael H. Moffett, *Multinational Business Finance* 9/E, Addison - 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Inc. 2001, pp. 397 - 401.

注释:

[ 1 ] Stephen J. Kobrin, "When does Political Instability Result in Increased Investment Risk," *Columbia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Fall 1978, pp. 113 - 122.

[ 2 ] Stefan H. Robock, "Political Risk: Identification and Assessment," *Columbia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July - August 1971, pp. 6 - 20.

[ 3 ] Jeffery D. Simon,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n Political Risk,"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Winter 1984, pp. 123 - 143.

[ 4 ] Wenlee Ting, *Multinational Risk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Greenwood Press, Inc., 1988.

(作者简介: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副教授,上海,200083)

收稿日期:2006 年 9 月

\*\*\*\*\*  
(上接第 63 页)

[ 19 ] 王宾:《中西文化关键词研究:身份(认同)》,《跨文化对话》(九),上海文化出版社,2002 年 7 月版,第 103 页。

[ 20 ] 吴玉军:《走出自我认同困境》,《新华文摘》,2006 年第 1 期,第 109 页。

[ 21 ] 同[ 11 ],第 105 页。

[ 22 ] 同[ 20 ]。

[ 23 ] 同[ 14 ],第 75 页。

[ 24 ] 布朗温·马多克斯:《阿拉伯国家悄无声息地弥合与以色列的贸易鸿沟》,载《泰晤士报》2006 年 4 月 7 日。

[ 25 ] 记者对以色列中央银行行长斯坦利·费希尔的采访:《斯坦利·费希尔认为,“高科技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新体现”》,载《费加罗报》2006 年 3 月 31 日。

[ 26 ] 同[ 11 ],第 88 页。

(作者简介: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博士,《阿拉伯世界研究》副主编)

收稿日期:2006 年 9 月

更 正

本刊 2006 年第 3 期刊登的《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换届会员大会暨学术讨论会综述》一文中,原句“冯绍雷、唐朱昌、赵华胜、李新、汪小澍、潘光、潘大渭、汪宁为副会长”有误,应为“李新、杨烨、汪宁、汪小澍、赵华胜、唐朱昌、潘光为副会长”。

特此更正。